

耶鲁学派解构主义批评译丛 / 朱立元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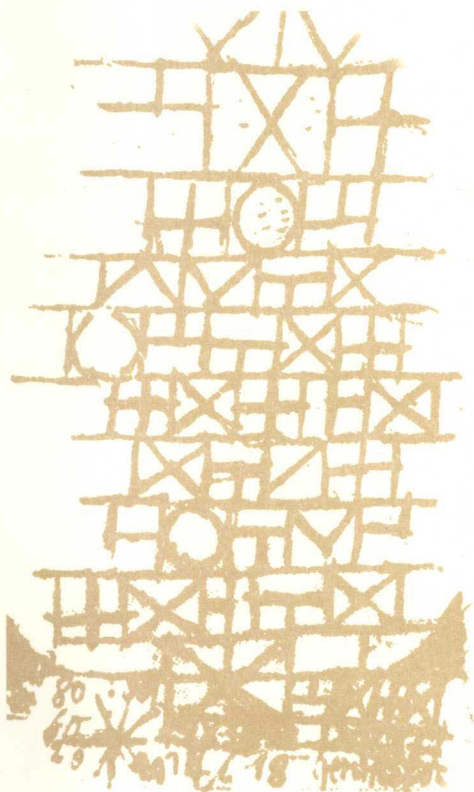
A Map
of
Misreading

误读图示

Harold Bloom

[美] 哈罗德·布鲁姆 著

朱立元 陈克明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误读图示

[美]哈罗德·布鲁姆 著

朱立元 陈克明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误读图示 / (美) 布鲁姆著; 朱立元, 陈克明译. 一天
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5

ISBN 978-7-201-05179-6

I. 误... II. ①布…②朱…③陈… III. 阅读学—研究
IV. 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571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2-2005-117

A Map of Misreading

Copyright © 1975, 2003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This translation of *A Map of Misreading, Second Edi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3,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字数: 180 千字 印数: 1-4,000

定 价: 28.00 元

总 序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起,在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直接影响下,在美国耶鲁大学形成了以保尔·德·曼、希利斯·米勒、哈罗德·布鲁姆和杰弗里·哈特曼为代表的耶鲁解构主义批评学派,人们戏称为“耶鲁‘四人帮’”。这四位学者出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著,把解构主义思想应用于文学批评领域,刮起了一阵解构主义旋风,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这套“耶鲁学派解构主义批评译丛”精选了四位学者的代表作:德·曼的《阅读的寓言》(沈勇译)、米勒的《小说与重复》(王宏图译)、布鲁姆的《误读图示》(朱立元等译)和哈特曼的《荒野中的批评》(张德兴译),现翻译、推介给读者。

《阅读的寓言》是耶鲁学派的领头人物德·曼的一部代表作。它提出了其独特的修辞学阅读理论,认为文学文本的语言存在着内在修辞性结构和矛盾,这决定了文本的自我解构特征;也因此导致文学文本阅读的不可能性即“阅读的寓言”,从而深化、发展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

《误读图示》的作者哈罗德·布鲁姆也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耶鲁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在该书中,作者吸收了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和德·曼的解构思路,认为阅读总是一种延异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写作和创造意义,所以“阅读总是一种误读”。他并把这一观点应用到文学史(主要是浪漫主义诗歌史)的影响研究上,提出了“影响即误读”的独创性结论。

《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作者J.希利斯·米勒至今仍是美国文学批评界的领军人物。本书对英国文学史上的七部重要小说作了详尽的解构主义分析和阐释，它抓住各部作品中重复现象不同的运作方式，进行细致的分析，并着力探索“意义怎样从读者与页面上这些词语的交接中衍生而出”，为人们理解这些作品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意义空间。

哈特曼的《荒野中的批评》也是耶鲁解构主义批评的代表作之一。该书结合作品分析强调指出，语言必定是隐喻式的，因而其意义是不确定的、多义的、变化的，文学文本的语言更是在不断破坏、消解自身的意义，因此是一种“持久的变项”；这也消解了文学与批评的界限，所以它反复强调批评也就是文学。它还认为，批评需要读者，读者既是作品的解释者，又是作品的创造者。

以上四部著作既是耶鲁解构主义批评学派的代表作，又有力地推动了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在美国的传播与发展。德里达的去世并不意味着解构主义的消亡。现在作为理论思潮的解构主义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作为一种有巨大影响的思想，它的理论思路、独特视角和研究方法等已经深深地扎根并融入当代各种学术、文化思潮之中，正在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耶鲁‘四人帮’”作为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的接受和传播者，特别在文学批评领域成功地应用、阐释、发展了解构主义理论，并加以推广和传播，在欧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的部分著作已经译介到我国，可惜以上四部著作在中国大陆至今没有译本，这是令人遗憾的。

我们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酝酿翻译这四部著作，并于1991年就完成了翻译。后又几易其稿，多次修改、整理，近期终于付梓。当然，由于是译本，就有一个联系版权的问题。这方面，除了岳勇编辑做了大量的工作外，我的好友、中学时代的老同学，美国宾州克雷瑞恩大学英语系主任徐乔奇教授自始至终给予了直接、全力的帮助。徐乔奇教授花

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帮助我们与哈佛、耶鲁、牛津三家出版社联系版权交易事宜，中间又有几度波折，他都设法解决。仅为此事，他就给我发了数十封电子邮件，打了好几次国际长途。这套书能够及时解决版权问题，乔奇教授功不可没。在此，我代表几位译者，首先向天津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岳勇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是他们帮助我们圆了出版这套丛书的梦；同时，也向夏康达教授、徐乔奇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是他们帮助我们联系了国内外的有关出版社。此外，我的师弟、南开大学陆扬教授慨然允诺帮助我们校订一遍，改正其中的不当之处，这真使我们非常感激。

这套译丛虽然出版得晚了一些，但是相信其中许多内容还是有价值的，希望它们对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和建设仍会有所启示。

朱立元

003

译者前言

在当代西方美学、文学理论学派林立,迅速更迭、瞬息万变的奔涌新潮中,美国的耶鲁批评派堪称佼佼者。在法国后结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影响下,耶鲁大学一批文学批评家和学者从“新批评”阵营中脱颖而出,转而举起解构主义的大旗。同法国人的风格不同,这批美国学者继承了本民族的重效益、重应用的实用主义传统,在阐发解构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更致力于将解构思想与方法运用到文学批评的实践中去;又在运用中各显神通,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丰富、发展了解构理论,从而形成了遐迩闻名的“耶鲁批评派”。这一学派的主将有四位:德·曼(Paul de Man)、米勒(J. Hillis Miller)、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和布鲁姆,所以号称为“耶鲁四人帮”。布鲁姆就是该派一位重要成员。

001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年生于纽约,1951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1955年在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同年起在耶鲁大学任教至今。开始,他是作为英美文学中浪漫主义传统的解释者而著称于世的,他对英美浪漫主义诗歌尤为钻研,造诣颇深。他早年的著作有《雪莱的神话制作》(Shelley's Mythmaking)(1959)、《幻想的伴侣: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导读》(The Visionary Company: A Reading of English Romantic Poetry)(1961)、《布莱克的启示》(Blake's Apocalypse)(1963)、《叶芝》(1970)、《塔内鸣钟者:浪漫主义传统的研究》(The Ringers in the Tower: Studies in Romantic Tradition)(1971)等,这些都是研究英美浪漫主义诗作的。1973年出版的《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和1975年出版的《误读图示》(A Map of Misreading),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影响即误读”

的理论,丰富了解构主义文学理论。此后,他还出版过《希伯莱神秘教义和批评》(Kabbalah and Criticism)(1975)、《诗歌与压抑》(Poetry and Repression)(1976)、《有才能的想象力的形象》(Figures of Capable Imagination)(1976)、《瓦莱士·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1977)等。布鲁姆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就是“误读”理论。

所谓“误读”理论,主要是就英美浪漫主义诗歌史上,一些强劲有力度的诗人接受前辈的“影响”而言的。在布鲁姆看来,影响不是对前人的继承,而是对前人的“误读”、修正和改造。这一论点最初是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提出来的。布鲁姆说道:“诗歌的影响——当这种影响包括两位强劲有力度的权威的诗人之时——总是通过对较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发生的,误读这种创造性的衔接、连接行为,确实是、并且必然是一种误解(或译误释:misinterpretation)。一部丰硕的诗歌影响史,即从文艺复兴起文本诗歌的主要传统,就是一部忧虑和自我适应的歪曲模仿历史,一部曲解的历史,一部反常的、任性的、有意修正的历史,而若无这种修正,现代诗歌本身也不可能存在。”就这样,布鲁姆不仅把影响归结为误读,而且把一部文学影响史归结为对前辈误读、误解和修正的历史。这同传统的“影响”论把影响仅仅看成前辈对后辈的传授、支配、左右以及后学对前辈的学习、模仿、继承显然完全不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传统影响论的叛逆和颠覆。

布鲁姆认为,误读实际上是后辈与前辈的斗争和冲突,一部诗歌史,至少部分地是伟大的诗人们同他们伟大的前辈们之间的斗争,譬如布莱克就是在为摆脱弥尔顿的决定性影响和“重写”《失乐园》的斗争中,确立起他自己的天才地位的;同样类型的创造性的冲突或者说张力,也存在于维吉尔与荷马、但丁与维吉尔、弥尔顿与斯宾塞、华兹华斯与弥尔顿之间。布鲁姆部分地吸收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观点与术语,把诗歌史上这种后

辈反抗前辈的“创造性冲突”，看成类似于儿子与父亲间的必然冲突，它通常包括儿子否认父亲的父权或父亲身份这样一个阶段。布鲁姆把这类冲突比喻为《失乐园》中的撒旦反抗上帝。他认为，在这类冲突中，诗人们开拓并“修改”了他们“前辈天使”的作品，以便于为他们自己清理出发展的空间。

在《误读图示》中，布鲁姆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了他的误读理论，十分鲜明地体现出某种解构主义的意向和色彩。

首先，他认为阅读总是一种“延迟”行为（典型的解构术语），因而实际上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解构主义认为，文学的文本是语言的文本，而语言的意义是不确定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只有能指之间永无止境的意义转换、播撒、延迟，而这一切只发生在阅读过程中。因此，文本意义是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它同作者原先写作文本时的意图是不可能完全吻合的，它总是一种延迟行为和意义偏转的结果。所以，寻找文本原始意义的阅读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阅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写作，就是创造意义。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解构主义思路，布鲁姆提出：“阅读，如我在标题里所暗示的，是一种延迟的、几乎不可能的行为，如果更强调一下的话，那么，阅读总是一种误读。”

其次，他重申了“影响即误读”的观点。他坚持认为，影响“不是指从较早的诗人到较晚近的诗人的想象和思想的传递承续”，相反，“影响意味着，压根儿不存在文本，而只存在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则取决于一种批评行为，即取决于误读或误解——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所作的批评、误读和误解”。这又是涉及解构主义另一重要观点，即不存在任何原初的、其他文本由此派生的原文，一切文本都处在互相影响、交叉、重叠、转换之中，所以，不存在文本性，而只存在“互文性”，只存在种种文本之间相互关系或互为文本的关系。据此，虽然文本出现的时间有早有迟，但早出的文本不一定是影响者，晚出的文本不一

定就是被影响者。因为,晚出者对早出者的误读或修改,实际上就是对早出者的影响。布鲁姆把这一解构主义“互文性”观点用于考察文学影响问题,就得出“影响即误读”的结论。既然影响意味着“互文性”,也即意味着诗人间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的实质也就是诗人间互相阅读,更确切地说是误读的关系。布鲁姆认为,这种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的批评和误读行为,“实质上同每一位有能力的读者对他所遇到的每一个文本所作的必然的批评行为并无不同。这种影响关系支配着阅读,就像它支配着写作一样,因而阅读是一种误写,就像写作是一种误读一样”。误读是全部诗歌史、乃至文学史的影响关系的实质。这是解构主义对传统文学史观的反叛,即对把文学史单纯看作是传递、承续、延伸的观念的巨大冲击。它更强调的是文学发展中的创造、更新和突破。

再次,布鲁姆还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影响关系中的误读行为。他认为诗人的创造性阅读(与写作)“将关系到别人,也关系到他自己,于是,他被置于修正者的两难困境之中:他既希望发现他自己同真理的原始关系究竟是在文本中还是在现实中(无论他是否把现实也当成文本);但是他也希望向所接受的各种文本展露他自己的痛苦,或者展露他想要诉诸历史的痛苦之事”。这就从心理矛盾的角度揭示了误读的必然根源,也为文学影响关系中的“互文性”提供了心理依据。

布鲁姆特别对创造性的误读即“修正论”进行了阐释,认为“修正论”“是一种导致重新估量或再评价的重新瞄准或重新审视”,“修正论者力图重新发现以便作出不同的估量与评价,以便进而达到‘准确’地瞄准”;他并用辩证法的观点发挥道:“发现是一种限定,重新评价是一种替代,重新瞄准是一种表现。”这种看法是相当深刻的。后辈诗人、作家在审视、阅读前辈的作品时,往往能发现他人未发现的东西,而这种独特的发现,实际上又是一种对前人作品意义的限制和确定,限定了只有他一人

看得到的意义域(或范围);而对前人的重新评价就是对以往其他种种评价的一种替代,即以一种新的评价代替了旧的评价,因而又拓展了前人作品的意义域;至于重新瞄准,乃是后辈作家对前人作品的中心点的重新选择和阐释,而这种选择和阐释何以集中于此点而不集中于彼点,完全取决于误读者(后辈作家)主体的思想、意图、视界、心境等,换言之,往往正是主体的上述诸心理因素的表现或外化。这些观点显然是富有启发性的,是对误读理论的充实与丰富。

值得重视的是,《误读图示》一书不仅在理论上发展了“误读”说,而且更注重把“误读即影响”的观点应用到诗歌批评和浪漫主义诗歌史的研究实践中去。他花费了许多篇幅研讨了勃朗宁的长诗《查尔德·罗兰》,考察了弥尔顿和爱默生对他们后继者们的影响,涉及到的诗人还有雪莱、济慈、丁尼生、华兹华斯、惠特曼、狄金森、斯蒂文斯、沃伦、爱蒙斯、阿西伯雷等。通过这种批评示范,布鲁姆把他的误读理论具体化、操作化了。

布鲁姆的误读理论问世以后,受到英美、乃至国际批评界和美学界的高度重视。虽然人们对之评价不一,争论不少,但一致认为这一理论是富有独创性、启发性的。美国批评家里德·怀特摩尔(Reed Whitemore)指出,布氏的误读理论“应是最近三百年来文学理论批评中最有争议、最值得讨论的课题之一”。另一位批评家赛义德(E. W. Said)说:“布鲁姆是最杰出的批评家之一,他有着对英语诗歌及其学术成就从整体上详尽把握的才能,同时也非常通晓最后四分之一世纪主要的先锋派批评理论。但是,在布鲁姆那里,他从弗洛伊德理论和依撒格·卢利亚(Isaac Luria, 16世纪犹太神学家)教义中汇集起来的这一庞大装备不只是学术上的行李。既然布鲁姆观点的核心是,每一首诗都是一种批评行为的结果,通过这种批评行为,另一首较早的诗就被有意地误读了,从而也被重写了,那么,由此亦可推论,布鲁姆对他所读之诗的感觉就是强烈地反抗、格斗,不断地体

验,积极地感受。”

这里不可能全面评价布鲁姆的误读理论,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包含着局部的真理性。布鲁姆强调了“影响”过程中误读、批评、修正、重写的一面,即创造、更新的一面,而打破了“影响即模仿、继承、接受、吸收”的传统理论格局。从辩证法观点看来,发展总是新陈代谢,只有继承而无创造、更新,就只能原地踏步而没有发展。在继承与创新这一对矛盾中,后者是主要方面,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因。这一观点运用于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无疑会形成一种新的眼光、新的视野,从而带来重大的突破与创新。当然,全面地看,布鲁姆的理论也有片面性,一是忽视了影响关系的另一方面——继承;二是把“误读”绝对化反而导致了某种相对主义倾向,取消了影响关系中的客观标准与价值尺度。这也正是解构主义的局限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初译稿 1992 年在台湾出版过繁体字本。由于当时翻译得比较粗糙,印刷质量也比较差,这次进行了较大的修订。特别要说明的是,这次译文最后请陆扬教授作了细致的校改订正,花费了他很多工夫,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者

2007 年 1 月

目 录

	001 /	导论:对误读的沉思
	005 /	第一部分 绘制领土的版图
007 /	第一章	诗歌的起源与最近几个阶段
	026 /	第二章 诗歌传统的辩证法
	040 /	第三章 原始的教导场景
	062 /	第四章 强劲诗歌的延迟
	081 /	第二部分 图 示
	083 /	第五章 误解的图示
104 /	第六章	检验图示:勃朗宁的《查尔德·罗兰》
	123 /	第三部分 图示的应用
	125 /	第七章 弥尔顿和他的前辈们
	146 /	第八章 弥尔顿的影响
	163 /	第九章 爱默生与影响
	182 /	第十章 爱默生的阴影
199 /	第十一章	阴影的阴影之中:现代

导论：对误读的沉思

本书沿承我前一本书《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所提出的诗歌理论基础,为诗歌的实践批评即如何阅读诗歌提供指导。阅读,如我在标题里所暗示的,是一种延迟的、几乎不可能的行为,如果更强调一下的话,那么,阅读总是一种误读。恰恰在文学的语言变得越加过分确定之时,文学的意义却趋于越加不确定了。批评也许不总是一种判断行为,但它总是一种确定的行为,它所要确定的是意义。

像我前一本书一样,《误读图示》也研究诗歌的影响,而且我仍然不想用这种影响来意指从较早的诗人到较晚近的诗人的想象与思想的传递承续。按照我的设想,影响意味着压根儿不存在文本,而只存在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取决于一种批评行为,即取决于误读或误解——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所作的批评、误读和误解。这种批评行为,同每一位有能力的读者对他所遇到的每一个文本所作的必然的批评行为,在性质上并无不同。这种影响关系支配着阅读,就像它支配着写作一样,因而阅读是一种误写,就像写作是一种误读一样。随着文学历史的延伸,所有诗歌必然成为韵文批评,恰如所有批评变成无韵的诗歌一般。

高明有力的读者,其阅读将关系到别人,也关系到他自己,因此,他被置于修正者的两难困境之中:他既希望发现他自己同真理的原始关系,究竟是在文本中,还是在现实(无论他是否把现实也当成文本)中;同时也希望向所接受的各种文本展露他自己的痛苦,或者展露他想要诉诸历史的痛苦之事。本书作为对诗歌阅读的创造性误读或延迟的研究,也是对修正论进一步研究的绪论,它将揭示源出修正论的经典形构的矛盾。

什么是修正论？正如这个词的辞源所表示的那样，它是一种导致重新估量或再评价的重新瞄准或重新审视。我们可以斗胆提出如下准则：修正论者力图重新发现，以便作出不同的估量与评价，进而“准确地”达到目的。在本书中，为了解释诗歌，我将使用辩证的术语；而用辩证的术语来说，则重新发现是一种限制，重新评价是一种替代，重新瞄准是一种表现。我将把这些术语从较晚近的或卢利亚传统的(Lurianic)希伯莱神秘哲学教义的语境中移植出来，我认为这种神秘教义是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的文本修正论的最后模式，对此，我打算在另一本书中加以研究。

Kabbalah(希伯莱神秘教义)，意谓“赋予”，是一种有关上帝的想象、比喻和准概念。其20世纪的主要研究者吉尔松·苏勒姆(Gershom Scholem)认为它是“神秘主义”的一个变种，当然，它同一个体验过种种超常意识的万能者交相融合，并且强化了那个万能者。但是，苏勒姆自己对Kabbalah的描绘强调凭借悬置技巧，来对《圣经》意义作阐释、修正和替代的工作。所有希伯莱神秘哲学的文本都是解释性的，宽泛地说则是纯思索的，它们所解释的是永远具有权威性、先在性和巨大力量的核心文本，或者不如说可以看成文本自身。希伯莱神秘哲学书籍中最有影响的《左哈》(Zohar)，是后启蒙运动强劲有力诗歌的真正先驱，但不是在其怪诞的内容或无形式的形式方面，而是在其对前辈文本的态度方面，在其修正的精神和对任意误解之必然性掌握方面。弗洛伊德有所发展，同时也有所掩蔽或回避的延迟心理学，就是Kabbalah的发明，而Kabbalah始终成为物质最大的独有资源，它帮助我们研究修正的冲动，并且为对照式的批评实践提供技能。

依撒格·卢利亚(Isaac Luria)，这位16世纪神学思辨大师，在修正了较早的希伯莱哲学的万物流溢说的基础上，概括出一种宇宙万物的四归理论。卢利亚对宇宙万物的论证，由苏勒姆、尤其在他的近作《希伯莱神秘教义》(Kabbalah)一书中作了明

晰的研究；苏勒姆本人同该书的关系是为本书理论部分的背景。但是，就我的目的而言，此处所绝对必要的，便是对卢利亚体系作简要评论。

如今依我看来，卢利亚的创世故事，对于研究诗歌影响的永恒冲突中，诗人们如何互相开战，是难得的最佳范例。卢利亚的故事，在无论什么版本中，都有三个主要阶段：Zimzum, Shevirath hakelim, Tikkun。Zimzum 是造物主的后退或收缩，以便有可能创造不是他自身的宇宙万物；Shevirath hakelim 是各种容器的分崩离析，这是对焕若大灾变的创世图景；Tikkun 是复原或回复——人对上帝劳作的奉献。前两个阶段，在许多解构主义理论家——从尼采和弗洛伊德到所有我们当代的解释者们——看来可能是近似的，他们把阅读的主体，要么解释为尼采所乐意称为“至多是个体的集合”的东西，要么解释为我自己愿意称之为一种新的神秘存在——特别由保尔·德·曼^①所明确暗示了的——作为超人的读者，即 überleser（超级读者）。这个假想的读者，既有点儿消极地实现自身，同时却又充满活力地超越自身，颇像查拉图斯特拉如此自相矛盾的表演。这样一位读者，既是盲目的，又是理智的，他是自我解构的，却充分了解他同文本、又同自然分离的痛苦，无疑他将超越那些收缩和破坏的修正之功，但这不简单等同于针锋相对予以复原，因为这种复原日益成为我们一切过去将来健全诗歌的与部分负担和功能了。

与卢利亚的“收缩”最接近的美学对应词是“限制”，这里说有些形象与其说是在复原或者表征意义，不如说是在限制意义。各种容器的分崩离析就像美学的分崩离析和某一形式取代另一形式一样，从形象上看，是一个替代过程。Tikkun，即卢利亚的“复原”，几乎已是表现自身的一个同义词了。

^① 保尔·德·曼(Paul de Man, 1930—1984)，美籍德裔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六七十年代美国“耶鲁批评派”和“解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本书作者布鲁姆在本书扉页上崇敬地写着：“献给保尔·德·曼。”

本书前五章主要探讨误解、或强有力的“误读”理论与技巧。后六章集中在读解的例子：弥尔顿、华兹华斯、雪莱、济慈、丁尼生、勃朗宁、惠特曼、狄金森^①、斯蒂文斯^②、沃伦^③、爱蒙斯、阿西伯雷等的诗歌。在前一部分，为了寻求误读的图示，我作了一次追溯文学起源的远航。从诗歌起源和诗的最近几个阶段之间密切的联结起始，这次航行首先回到文学传统如何形成的过程，接着回到“原始的教导场景”过程的种种根由，最后回到对延迟的沉思。这一沉思集中在影响之上，作为对阅读/误读行为六重防御比喻的影响。接下来，比喻、防御、形象和修正率的关系，将在讨论误解的一章里得到阐发，误解图示也是本书的目标。再下来是对勃朗宁一首诗《查尔德·罗兰走向幽秘高塔》的全方位阅读，以阐明这一误读图示的用法。在本书最后部分，以这个图示作为我们的向导，考察了从弥尔顿一直到当今许多影响的变体。

本书最后部分，从分析弥尔顿的引喻开始，分别讨论代喻(metalepsis)和转代比喻(transumption)、依撒格·卢利亚称之为“gilgul”的最终修改率的古典对应词，以及一位先辈因其后代的行为而获得再生，后人从他支离破碎的丑陋外壳中拣起一息尚存的火星，重又点燃起来。紧接着的一章论述从华兹华斯到丁尼生等弥尔顿的后裔。此后，本书的其余部分论述美国诗人，首先论述的是他们的先驱和诗学理论家爱默生，他与后起的美国诗人们的关系，同弥尔顿与他之后的英国诗人们的关系正相类似。

① 狄金森(Dickinson, 1830—1886)，美国浪漫主义诗人。

② 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 1879—1955)，美国诗人。

③ 沃伦(Warren, 1905—1989)，美国诗人。